

“我只能用一种方式守望甘南”

——记刚杰·索木东和他的诗 □严英秀(藏族)

2013年春节,诗人刚杰·索木东携着年轻的妻子和一天天淘气起来的稚子,回到了他的家乡——藏王故里、洮砚之乡卓尼。当他暂别生活了近20年的繁华城市,一路向南向遥远的甘南之南驶去,当甘南在车窗外渐次绽开,刚杰·索木东的脸上该是怎样的表情?衣锦还乡的世俗成就,是否使他格外地关注到了那些在寒冷的天气里捧着书本憧憬着远方的少年?他们多么像他遗留在这片土地上的16岁。或者,轻薄的成就感转瞬就被另一种更有力的情感消融?那是巨大的幸福和悲怆,它们横亘在故土的每一缕空气中,只要他走来,每次他走来,它们便倾巢出动,候在他必经的回乡路上:“一条悠长的路通向甘南,亘古的风雪塞满我的温暖/故乡啊,甘南/一堆篝火燃起一匹马的寂寞/贴紧热身子是你痛心的贫穷……”

这一切,都在我的想象之外。一直以来,关于刚杰·索木东和他的诗,他的甘南,我基本处于失语状态。他和它们离我太近,使我无法退居到一定的距离外,保持一个恰如其分的审美姿态。但终究,在重复了无数次的阅读之后,我必然地要面对自己的混沌和错杂,如同刚杰·索木东所说,“我只能用一种方式守望草原”。

20年前,刚杰·索木东在跨进大学校门的同时,就开始了他的汉语诗歌创作。虽然他读的是数学专业,虽然数学被称为“最迷人的艺术”,但显然,奥妙无穷的演算和推理却并不能有效安妥一个离乡少年的狂躁郁闷,心灵的出口无可选择地指向了诗歌。这被当时的老师同学所訝异的“专业错位”,或者说“不务正业”,其实究其细里是再自然平常不过的事——藏族有发达的抒情传统,民间生活中充斥着古老的谚语歌赋,许多人开口即诵,藏族作家的文学创作也大多从诗歌起步。刚杰·索木东开始以诗歌的形式说诗时,身前身后已堆集了太多的同族诗人。他和他们并无异样,在一天天变着模样的城市里,浪迹于意念中的故乡,那离别半步即成天涯的草原。从那个时候开始,刚杰·索木东一路写到了今天。今天,那些青春作伴的身影已渐次相忘于江湖,诗人和诗歌共同告别了曾葱茏无比的好年华——但诗歌依然是眉头的结、胸口的疼,但歌咏故乡依然还是需要用剩下的日子慢慢去面对的事。在经历了生活中的种种之后,刚杰·索木东比以往更加确信,没有什么途径比诗歌更能抵达故乡,没有什么词语比故乡更适合安眠在诗歌中。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这是生活在草原之外的诗人海子偶尔路经草原时留下的诗句,但这分明是刚杰·索木东的切肤之痛。广袤的甘南草原、美丽如画的藏家山水,在铺天盖地的旅游宣传中,它是美轮美奂的画卷,是关于各种奇异浪漫的风情、优美淳朴的民俗的演示,是许多个“最后一片净土”中的一个。但在生于斯长于斯的女儿们心里,它其实是立在村口地头悄悄抹泪的白发亲娘,她的脚步不再是你恬然安居的地方,你要远去但却难以割舍,“远去的脚步/在那条老路的尽头/敲响整整一生的思念……”是的,刚杰·索木东所有的诗章只是在轻轻诉说:故乡是甘南。而他,在远离它的地方,“坚持用一种方式”,“坚持用一种心情”,“坚持用一种姿势”,“完成着一生的眷恋”。

在藏族作家曹有云的诗歌中,原始的、神秘的、神圣的诗质始终贯穿于其浓郁的诗艺中,不动声色,浑然天成。他的诗善于发掘生活中的诗意,神采俊逸,境界开阔,气势雄拔。曹有云曾说,“我一个人在积雪的山坡上坚持写作,寻找最后的词语和唯一的位置”。的确,他的诗歌宛如一座积雪的孤峰,显得那么特别。

“蓝天剔透,天风浩荡/阳光倾泻,万物歌唱”(《高地的颂歌》),“抛掷词语锋利的矛/穿透远方僵硬的墙/塔楼轰然倒塌/道打开,可爱来”(《力量》),“岩石滴水/皓月朗照/昆仑白玉在幽谷/焕发梦的光辉”(《格尔木2007年第一场春雨》),“太阳走过/生成粮食和黄金/留下破碎的建筑/太阳走过/凝成泪水和梦想/留下坚硬的语言”(《太阳走过》)……这些诗句天然清新,节奏明快,颇有民歌风味,有着对《诗经》起兴手法的继承,蕴含“建安文学”的慷慨悲凉。可见,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古典诗歌艺术早已浸润了曹有云的诗歌。

当然,继承是为了创新,汲取是为了茂盛,或者说,是为了寻找到自己真正属于自己的诗歌话语。曹有云始终踏在自己的路上,他明白一个诗人首先是一个“人”,是阳光普照下的独特个体,诗人在吟唱自己的歌谣。面对永恒的美与自然,每一个诗人都歌唱属于自己的歌谣!高原、月亮、田野、草原、旷野、沙漠、雪花、星空、火焰、灯盏、老虎、豹子等,这些千秋万代默存于天地之间的丰茂意象交相辉映,如同群星闪烁在冬日的夜空,编织出曹有云诗歌的独特光彩。

在黔东南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聚居着土家族、苗族、侗族、仡佬族等少数民族,诞生了许多的作家、诗人。当然,我们现在谈到“黔东南少数民族作家”,不仅指黔东南籍的少数民族的作家,也包括外来黔东南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以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文化精神,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文学作品。据不完全统计,黔东南少数民族作家在《民族文学》《诗刊》《山花》《中国作家》《十月》等报刊发表作品500余件,出版个人专著达100部,其中吴恩泽、龙潜、田永红、赵朝龙、完班代摆等人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成为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乃至整个贵州文学创作的一支生力军。

在小说方面,土家族的斯基、田永红、林照文、黄方能、晏子非、何立高、孟学书,苗族的吴恩泽、龙岳洲、龙潜、赵朝龙、侯长林、罗漠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斯基是一个典型的“漂泊作家”,少年时代离开黔东南印江,投入革命,早期的创作受到革命文学的影响,如短篇小说集《生长》,大多写的是解放区的生活。改革开放之后,先后发表中短篇小说《分道扬镳》《追求》等,并出版有《昨夜风雨》等长篇小说。他的作品淡化故事情节,侧重人物心灵世界的挖掘。

吴恩泽是一个具有典型地域文化精神的作家,其长篇小说《平民世纪》《伤寒》等对地域人群人性持续关注,体现出少有人道主义关怀意识。如《蛮女阿凤》《无妄》等小说都是描写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变迁,凸显人性美好与黑暗的两面性。

在黔东南,以乌江作为创作对象的作家大有人在,似乎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群落,试图再现乌江文化的根脉。田永红的小说主要是注重历史进程的书写,如长篇小说《盐号》就是以乌江盐号在历史进程中的命运作为符号,有一定历史足音。而赵朝龙的“乌江小说”大多以“乌江汉子”为原型,表现的是人战胜自然的力量。如中篇小说《乌江上的太阳》,把人性与自然结合,把乌江原生态的文化与人性有机融合,把乌江文化立体表现出来。还有土家族的林照文,把乌江流域的卑微人物融入

故乡是甘南,刚杰·索木东的故乡,我的故乡。甘南从梦中走过,月光像诗一样铺满金子般的草原。但即便是在梦中,我们也忘不了,甘南并非乐土,它有多么美丽博大就有多么荒凉贫瘠,它有多么温煦悠扬就有多么忧伤局促。它在夏日里捧出世间最美的海子,又在初秋的第一场风雪里就让羊群和草地在凛冽的肆虐中褪尽了颜色,它诞生了传奇和史诗中的那些英雄部落,如今在城镇化的潦草和慌乱中却呈现着尴尬苍白的命运。这样的故乡,刚杰·索木东从来没有停止过回望,他叩问自己:“走出故里我就能摆脱困苦吗/甘南,遥望经年的故乡/贫穷苦难夜撕裂我流血的心恩……”

“故乡是甘南”是刚杰·索木东的创作母题,这使得他的诗歌很容易被划归到乡愁诗的谱系。这是一个无比强大久远的谱系。从最初《诗经》中的“我徂东山,惴惴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濛。我东归兮,我心西悲”开始,乡愁便成了再不断绝、历久弥新的诗歌主题。屈原说“陟陞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李白说“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说“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贺知章说“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马致远说“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在当代诗歌中,郭沫若有《黄浦江口》,闻一多有《太阳吟》,戴望舒有《游子谣》,余光中的《乡愁》更是震撼了海峡两岸共同的心弦。虽然如今乡愁,其产生的背景时势已大不同,但传统的影响还是明显地表现在刚杰·索木东的诗歌中:对民族的认同、归依,对故乡的思念、眷恋,对文化的挚爱、追寻。深沉的悲患情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鲜明的文化精神,使刚杰·索木东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诗美建构。惯常的主题在他的诗中因其独特的藏族文化和甘南地理,而显得更加深邃、斑斓,他他以清新流丽的诗篇为源远流长的中国乡愁诗增添了一分别样的色彩。

但其实,我并不想做如此理性而愚蠢的分类和概括。我知道,刚杰·索木东之所以“用四季的四种方式怀念甘南”,之所以绵绵不绝地写着草原和星空、神鹰,写“大金瓦寺的桑烟刚刚升起”,写“黝黑的屋檐下畏寒的麻雀”,写“长夜漏风的黑帐篷”里“以泪洗面的新娘”……只是因为这就是曾属于他自己的过往岁月,所有的回忆都让人“想起十八年前的那个少年”。正是在这一点上,刚杰·索木东的诗歌从根本上区别于那些在东部期待视野下的所谓西部诗歌,那种邀宠炫美式的“民族写作”,更区别于那些观光客冷漠时髦的漫笔纪事。无关痛痒的浮尘,从不会缭绕在刚杰·索木东的诗笔之下。对于他,所有的地理人情、土风民谣,都是成长的印迹,都是心灵的故事。他以自然的笔调记录它们,他以神圣的情感追怀它们,那些正在草原上一点点消逝的事物,那些如同老家新渐面容模糊的古老文明,他愿意以自己的方式定格,正如老家的木楼早已在时间中倒塌了,但他的灵魂始终流浪在它的旧尘缭绕中。关于故乡甘南,关于甘南大地上的一切,它们本来就是他,他与它们融为一体,而如今,“游牧在一座城市中,他不过是找到了可以回望、追怀它们的适宜地点,找到了坚持那种身心撕裂的无奈方式。他让自己深信不疑,诗歌的力量正在于此,它以微弱之光持久地照耀着我们黯淡紧张的人生

一座积雪的孤峰

——评曹有云的诗 □青 蒙

线。“一只真正的老虎/远比神话和废墟更加久远、更加真实的/活的老虎/雄壮野蛮的老虎/人的生命有关,它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生命体,这种语言的运动被诗人称作“生命的呼吸”。曹有云在《挖掘》中写道:“人类和祖先们一起/留给我时间的火焰/和锋利的词语,他们让我/向着记忆/黑暗的石头深处挖掘——/抡起开荒的锄头/尽快给两岸即将消失的玫瑰和飞鸟/重新命名/……也让我们,从腐烂的花瓣和死亡的灰烬中/再次生长成石头/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石头/永恒的石头……”在这里,写作被形象地概括为“挖掘”的动作,这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因而诗作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力。

诗人到底是什么?批评家孙基林说,诗人是以诗安身立命的那类人。因而,诗一定与诗人的生命有关,它是由语言和语言的运动所产生的生命体,这种语言的运动被诗人称作“生命的呼吸”。曹有云在《挖掘》中写道:“人类和祖先们一起/留给我时间的火焰/和锋利的词语,他们让我/向着记忆/黑暗的石头深处挖掘——/抡起开荒的锄头/尽快给两岸即将消失的玫瑰和飞鸟/重新命名/……也让我们,从腐烂的花瓣和死亡的灰烬中/再次生长成石头/更加生动而深刻的石头/永恒的石头……”在这里,写作被形象地概括为“挖掘”的动作,这是一种全身心投入,因而诗作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生命力。

崛起的黔东南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向笔群(土家族)

小说的创作中,表现笔下人物在生活大潮中的无奈,甚至消沉,如小说集《过不去的河流》中的作品。

龙岳洲的小说创作,民族文化元素并不浓郁,他的长篇小说《黑瓦房》以中学生为描写对象,可谓“成长小说”。罗漠在他的大学时代就发表了《黄月亮》《灵灯》《红月亮》等小说,对贵州青年创作产生过较大影响,后来又出版小说集《乡村与城市边缘》。还有一批作家则注重民族文化的注入。黄方能小说集《回望故土》中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地域文化元素为经纬交织的文学群像,包含他对地域文化精神的不懈追求。晏子非在短篇小说《阳光下的葬礼》中也体现了一定的地域意识。

散文方面,土家族的安元奎、刘照进、隐石、张贤春、冰皓、陈丹玲、苗族的完班代摆、龙凤碧,侗族的罗中玺等都写出了较好的作品。其中,完班代摆的长篇地域历史文化散文《松桃舞步》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刘照进的散文集《陶或易碎的片段》获得贵州文艺创作奖,安元奎的散文集《乌江吟吟》获得贵州省作协乌江文学奖。

完班代摆起初写诗,后来改写散文。其创作具有一种地域文化的倾向,他把家乡苗族的 历史进程与文化的根脉进行立体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历史穿透力。刘照进的散文往往是长短句相接,给人一种文字建筑的美感,凸现出文字流动色彩,给读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如《空鸟巢》《缓缓穿行》等作品,把地域语言和现代意识有效地嫁接,凸显出其创新意识。安元奎的散文立足于对乌江文化的挖掘,他以一种虔诚

里那些柔软的缝隙,那些存放在记忆深处的眷恋和热爱、放弃和疼痛。正因如此,刚杰·索木东的诗自然、本色、真挚、热烈,是纯粹意义上的抒情诗。他的忧伤、他的悲愁、他对于故乡甘南多年如一的执著守望,赋予其诗作真诚的质地。在我看来,真情的重量,远胜于一切旗帜潮流的标示,远胜于任何先锋后现代的诗歌技艺。

2010年,对刚杰·索木东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年份。这一年,他喜得贵子,完成了一个男人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角色转变。在《2009,最后的絮语》中,他写道:“不知道春暖花开/在今年会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初为人父/在今年会是什么样子/向上,再向上一点/似乎2010年/我会这样提醒自己。”事实上,他正如自己所期许的那样,向上,再向上了一点。这一年,他在诗歌创作上有了长足的进步,诗风更加趋于深沉、内敛、丰富,他的目光在眺望故乡甘南的同时,也落到了他所身处的城市环境中更广大的艰辛奔波的人群中,去面对对现代人共同遭遇着的漂泊无根的心灵现实。由此,他的乡愁和抒情有了与之前不同的另一种况味:“那个来自高原的蝴蝶/在水泥铸就的窗台边/叫了整整一夜/那个十 个远离潮湿的泥土/和阴凉洞穴的烟媚/十个 个远离嫩绿芽苜/和甜甜露滴的烟媚/在尾气和闷热充溢的笼子里/在自来水和温棚菜的饲料里/叫了整整一夜……”(《十个烟媚,或远离的高原》)

《残缺的世界》是一组简洁有力的诗歌,体现了刚杰·索木东独到的观察力和表现力。多年城市生活的忧心焦虑结晶出了思想之果,草原少年的柔弱心灵开始以悲悯之手抚摸匆匆人流视而不见的“残缺的世界”:“谁能对一只断手熟视无睹?/藏我于衣袖吧/藏我于,永远/无人可见的黑暗/我将于一缕血痕间/独自珍藏/有关扼腕的/所有秘密”(《断手》),“如果剑心之后/尚能存活/那我必将选择/永远的沉默/这个世界已经残缺/如此,即使拥有/一颗七窍玲珑的心/我又怎能/把深处的创伤/向人类诉说”(《空心》)。

长冬无雪,但春节之后是情人节,热闹总是找得到一茬又一茬的迎春。在被烟花璀璨装扮着的城市天空下,你会觉得一个人不融入盛世的欢娱是可耻的,所以,当刚杰·索木东颠簸在回乡又离乡的路上时,我正疲于远离故乡远离藏历的节庆里。这样的时刻,我知道我不是找不着星空,而是找不到可以瞭望星空的窗口。这样的时刻,想起海德格尔说的,“归乡是诗人的天职”,也想起甘南诗人阿信说的,“回得去的叫老家,回不去的才叫故乡”。想起刚杰·索木东“在古老的屋檐下,醉卧成游子的模样”,他是否看清了炊烟升起的方向,感受到了血脉奔流的那份通畅?或者,“失去母语的那个村庄,”已然成为他此生无法回转的故乡?或者,他正在贴近着的甘南,我正在遥望着的甘南,注定要成为我们共同的甘南记忆?还要经历多少次的归去和离别,我们才能淬心砺骨地懂得:“自己既非过客,也不是归人”?

好在,还有诗歌。因着诗歌,那一场遥远的风雪再一次温暖地落到了我迷茫干瘪的思念里:“年关的那一场大雪/已经不再那么可怕/所以,我有大把的时间/和大把的心情/给在城里出生的儿子/堆一个憨厚的雪人/这样,在他的尖叫声里/就会找到回家的路/偶尔也会/在宿醉的夜半/偷偷醒来,偶尔/也会在静谧的院落/数数童年的星星/温暖的炉火旁/已经很难听到/亲人太多的叮咛了/因为自己,也在/慢慢老去”。老去的只是年纪。因为我们依然愿意相信,不老的是青春,是无论何时何地都以心的温度捂着的故乡,是故乡之脉盘根错节生生不息的诗歌。

何其相似——可理解为时间、死亡、虚空、不可抗拒的命运等。

曹有云居住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藏高原城市格尔木,那里有万里长江的发源地——海拔6000多米的各拉丹东雪峰。或许是奔腾咆哮、不可驯服的江河魂魄落入了曹有云的血脉,他诗歌中颇有李白“落笔摇五岳”之势,行文隐含着斧劈刀削般的功力,如“我们以巨大而连绵的精力/用想象、语言和锋利的笔/把粗糙的石头和土块/打磨成精密而堂皇的宫殿”(《命名》);“在词语、音节和声响/浩瀚的河床/日夜汹涌澎湃的海”(《海》);“我释去千年如铅的重负/轻松似燕,自由如风”(《发现》)。

一个生活在高原的诗人更接近不染尘埃的蓝天白云,更接近温暖明亮的太阳。曹有云显然珍惜命运之神的眷顾,他从高海拔的独特气息中磨砺出顽强的毅力和滴水穿石的耐力,拥有的是满腔开阔高山般磅礴的情怀。他咏颂人间的爱、自由、尊严、欢乐,如“谁在悲恸的寒夜中醒来/谁在海拔3000米的高地/零下20度的气流中临风吟唱/谁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贫穷的语言”(《黎明前的默语》)。诗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真诚、智慧和怜悯之心,那是一颗赤子之心,献给哺育人类的大地和照耀着人类的太阳。

曹有云在《兄弟》一诗中写道:“在春天,要顺其自然/倾听布谷鸟殷切的召唤/面对大地/诚实劳动”。是的,曹有云“诚实劳动”,不盲从于不懒惰,他试图用自己的诗作去唤醒照亮某些沉睡的灵魂。

何其相似——可理解为时间、死亡、虚空、不可抗拒的命运等。

曹有云居住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藏高原城市格尔木,那里有万里长江的发源地——海拔6000多米的各拉丹东雪峰。或许是奔腾咆哮、不可驯服的江河魂魄落入了曹有云的血脉,他诗歌中颇有李白“落笔摇五岳”之势,行文隐含着斧劈刀削般的功力,如“我们以巨大而连绵的精力/用想象、语言和锋利的笔/把粗糙的石头和土块/打磨成精密而堂皇的宫殿”(《命名》);“在词语、音节和声响/浩瀚的河床/日夜汹涌澎湃的海”(《海》);“我释去千年如铅的重负/轻松似燕,自由如风”(《发现》)。

一个生活在高原的诗人更接近不染尘埃的蓝天白云,更接近温暖明亮的太阳。曹有云显然珍惜命运之神的眷顾,他从高海拔的独特气息中磨砺出顽强的毅力和滴水穿石的耐力,拥有的是满腔开阔高山般磅礴的情怀。他咏颂人间的爱、自由、尊严、欢乐,如“谁在悲恸的寒夜中醒来/谁在海拔3000米的高地/零下20度的气流中临风吟唱/谁更加热爱生活,热爱生命/热爱贫穷的语言”(《黎明前的默语》)。诗人始终保持着一颗真诚、智慧和怜悯之心,那是一颗赤子之心,献给哺育人类的大地和照耀着人类的太阳。

曹有云在《兄弟》一诗中写道:“在春天,要顺其自然/倾听布谷鸟殷切的召唤/面对大地/诚实劳动”。是的,曹有云“诚实劳动”,不盲从于不懒惰,他试图用自己的诗作去唤醒照亮某些沉睡的灵魂。

黔东南是一个充满诗性的地域,诗人辈出。改革开放初期,苗族马仲星、林亚军等诗人书写了很多以歌唱时代与生活为主题的诗作,在写作手法上借鉴了较多的古典元素,如林亚军的《中国雪》、马仲星的《漂泊的心情》、傅强的《乡韵》等。罗中玺的诗歌,特别是他的爱情诗表现真感情、真性情,属于“喧嚣时代的真情呼唤”。

黔东南的一些少数民族诗人在创作上开始了对先锋艺术的探索,代表诗人有侗族的朱良德、土家族的谁达摩、徐必常、隐石、马晓鸣、蒲秀彪、王小松,以及“印江四诗人”(苗族的王晓旭与土家族的朵菘、任敏伟、非飞鸟)等。早在上世纪90年代

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是一个善于思考时间问题,并对宇宙间大生命投于无限悲悯情怀的诗人。这让他 的诗获得了大地般深厚的品质,又具有深刻的现代性品质。

时间是宇宙的根本性问题之一,因为谁都无法躲避时间,任何人的存在也总是“在时间中”的存在。正因为这样,人类艺术史上才留下那么多关于时间问题的思考。也许,偏僻蛮荒的小凉山一带的人文环境更让鲁若迪基多了一份从现代社会 的繁忙与麻木中抽身出来,沉浸于时间与生命的各种自然事项中的可能。于是,我们发现,鲁若迪基写得最好的诗,几乎都是从那种世俗的、为我们习惯了、流动不息的时间长河中打捞出来的时间的“定格”。这些诗为我们提供了静下心来细细体验生命的可能,它们甚至成为了我们窥视时间的“窗口”。

短诗《日子》中有这样的句子:“日子是有牙齿的/只是在牙床下面/就像给孩子喂奶/冷不防咬你一口/揪心的/——疼。”我们知道,宇宙间所有个体的生命过程都是一个与时间抗争的过程,可惜的是,抗争的结果早已被注定——个体生命总是时间的战败者,最终都在时间长河中灰飞烟灭。我们最根本的不幸就是,我们始终并将永远只能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是我们永远无法超越和摆脱的宿命。于是,人作为一种有限性的时间存在,时间每一分每一秒的流逝都成了我们生命中永远无法抹去的疼痛。在《日子》这首诗中,“牙齿”、“牙床”的意象贴切而生动,写出了时间对人的啮食感,而“就像给孩子喂奶/冷不防咬你一口/揪心的/——疼”几行,更是残酷地写出了个体生命对时间流逝的疼痛感和恐惧感。

在另一首名为《无法吹散的伤悲》中,鲁若迪基把人的时间的有限性放在浓浓的亲情中来书写,产生了刻骨铭心、催人泪下的审美效果。诗中写道:“日子的尾巴/拂不尽所有的尘埃/总有一些/落在记忆的沟壑/屋檐下的父母/越来越矮了/想到他们最终/将矮于泥土/大风也无法吹散/我内心的伤悲。”全诗在叙事的口吻中,紧紧抓住“屋檐”、“矮”、“泥土”这些表现力极强的意象,写出了人在川流不息的时间河流里的宿命,死亡并不因为人间的爱与亲情而迟来一步。鲁若迪基诗歌中这种“有时间性”的现代人的视界,以及他对“时间性”的思考充分体现了他诗歌的现代性品质。

对宇宙间生命抱以深刻的悲悯情怀是鲁若迪基诗歌的又一特点。在他的诗集中,有相当数量的作品涉及到了各种常见的动物,甚至直接以动物的名字作为诗题,如《雪地上的鸟》《我曾见过的乌鸦》《鹰》《狼》《羊》《布谷鸟》《心中的鸟儿》(斯图加特的一只喜鹊)。这类诗歌传递出了他对宇宙间生命哲学的沉重思考和热切关爱。比如《一群羊走过县城》:“一群羊被吆喝着/走过县城/所有的车辆停下来/甚至停下来/让它们走过/羊不时看看四周/再警惕地迈动步子/似乎在高空大厦后面/隐藏着比狼更可怕的动物/它们在阳光照耀下/小心翼翼地走向屠场”。诗人抓住一个充满张力的生活场景,通过将“阳光照耀”与羊群“走向屠场”拼贴在一起,把人类行为的残酷性、弱者的生命命运等都做了呈现。

我不愿用笼统的生态意识来概括鲁若迪基的这一类诗歌,因为诗人对宇宙生命的深切关怀已远远超过了一般生态问题。在《路遇》中,诗人写他在雨后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惟恐不小心踩死路上的一只青蛙,接着诗人由自己的行为而呼吁天地间更多一份怜惜生命、珍爱自然、保护弱者的生命情怀。在《雪地上的鸟》中,鲁若迪基继续着这种生命情怀,写雪地上因“没有家/没有东西吃”而“蜷缩成一小团”的鸟,它们的命运并不因为环境的恶劣而得到孩子们更多 的同情与关怀:“它们的眼里/世界是那么的小啊/小得没有它们藏身的地方/雪不停地下着/它们已听不到什么声音了/而拿着弹弓的孩子们/正悄悄地向它们靠近。”

在很多诗作已经沦为为私己生活的日记式记录的当下,鲁若迪基诗歌中深刻的生命意识和关爱情怀值得关注。诗歌批评家奚密曾谈到,“当现代诗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个人意义和美学意涵的同时,它却失去了过去公认的社会道德意义”。在我看来,鲁若迪基的诗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这一弊病。

初,谁达摩就出版了诗集《橄榄石》,引起诗坛注意。徐必常出版有诗集《朴素的吟唱》,诗歌创作注重亲情的书写,情感比较饱满,朴素的语言隐含较大的生命意蕴。朱良德出版了诗集《稻草哲学》,其大部分诗歌都是地域性乡村精神书写,抒情格调比较明显,同时也具有一定现代性。马晓鸣诗歌的政治语境比较浓厚,大多数作品与时下的进程有密切的关联。蒲秀彪出版有诗集《随时随地》,注重诗歌的口语化,反讽的情绪构成他的诗歌创作特色,过程的延展性书写成为追求的倾向。王小松出版了诗集《走不出这片土地》,基本是以乌江地域的物事作为书写的对象,乡情灌注其中。

在散文诗方面,土家族的喻子涵、冉茂福、陈顺、田森、罗福成等,成就较高。喻子涵以散文诗集《孤独的太阳》在1997年获得了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2007年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优秀散文诗作家”,成为贵州散文诗领域的领军人物。冉茂福出版散文诗集《守望乡村》,表达他的家园意识与故乡情怀。陈顺的散文诗《指尖上的庄园》通过对乡土生活的书写表达对生命的守望。田森发表了 不少的散文诗,是一个散文诗文体追求者。可见,散文诗作家已成为黔东南少数民族诗歌创作的一支“轻骑兵”,驰骋在贵州文化的百花园里。

黔东南在戏剧创作和文学评论方面也有发展。从事戏剧创作的有苗族的林亚军与土家族的何立高,林亚军创作了《民办教师》《乌江土家妹》《明天再见》等剧作。何立高创作了《夫妻哈哈笑》《土家山寨的红蜡烛》《蛮王的子孙》等剧作,其中《夫妻哈哈笑》获2001年度文化部戏剧“群星奖”。

持续进行文学评论写作的是土家族的隐石和路曲。隐石以现代文化意识为基调,对当下文学现象与问题进行批评。路曲立足于大武陵少数民族作品与文化的探讨,发表了大量文艺评论。长篇论文《当代土家族青年诗人的传统文化承载》被多家报刊发表并转载,其中《当代重庆少数民族文学论》入选《2011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年度选(评论卷)》。

对时间和生命的歌咏

——读鲁若迪基的诗歌

□马绍奎(回族)